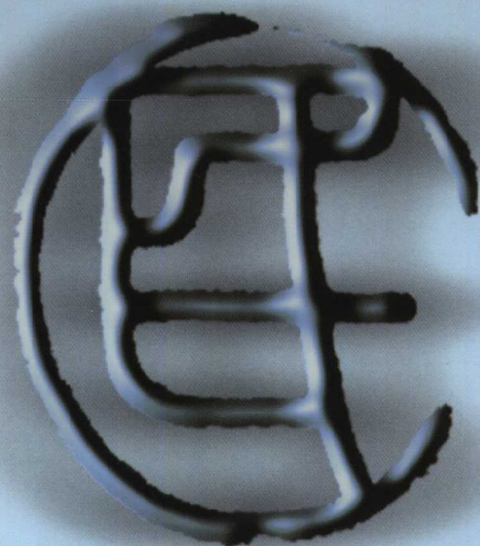




一九二〇年代的 中国

China in 1920's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丛书·中华民国史学科

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

China in 1920's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前 言

20 世纪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恐无论何人从何角度，估计均不会过低。1911 年辛亥革命的爆发，由武昌一隅迅即推至全国，终至倾覆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王朝帝制，开创共和时代，此当为中国历史千年之变。民国成立后之历史发展更令人眼花缭乱，事件迭出，并不因其时间短暂而失去意义，留下之遗产至今仍可圈可点，引来多少历史学家流连其间。正因为如此，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于 1972 年首倡民国史研究以来，历三十余年，民国史研究从无到有，发展成为备受当今史学界关注的显学与国际性学科，从事研究的学者之多及出版的研究成果之丰，均为中国历史研究之最。可以预见，在未来若干年内，民国史研究还将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领域。近代史研究所的民国史学科，向领民国史研究风气之先，自 1996 年以来一直被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学科。如何集合学界同仁，共同推动民国史研究的进步，是本学科的重要任务，此亦为我们联络各方，进行学术讨论之初衷。

如何研究民国历史，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惟就历史研究的现实而言，研究者比较习惯于以纵向时段为经、历史事件为纬而切入，尤以公认之“重大事件”作为历史分期之标志与研究之主题。如此，我们就有了辛亥革命研究、北洋军阀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等，其间之便利不言自明，然于其不足之处或有忽略。人们尝谓历史有如长河，因其绵延不绝而更显其传承，在中国这样有数千年文明史和史学编纂史的古国尤其如此。在历史的长河中，就许多基本方面而言，本无所谓截然分明的界标，亦无所谓显然可见的断裂。今人所谓“古代史”、“近代史”与“现代史”之分，不过是历史学者为了论述的便利，以一定的标准而定，况且学界对“古代”、“近代”与“现代”的分期，也在不断地讨论变动之中。研究中国古代史者，习惯以朝代定论域，故清史与民国史显有分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者，长期以“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与“现代”分期的标

志，而目前将 1840 ~ 1949 年的历史打通，一并作为中国近代史则已成学界主流。如此历史分期，大体以王朝更替或重大事件为标志，而以政治变迁为主要的考量标准，较少顾及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变化。但实际上，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更具有历史的基础意义，却又甚难以所谓重大历史事件来作分隔。故我们尝试以“年代”为论域，以“年代”替代“事件”作大致的分期，期以探讨较长时段内的历史演变，以利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会通观察。近代以来，历史变迁的节奏明显加快，将“年代”的视野引入近代中国的考察，正能凸显此等变化趋势。就 20 世纪中国而言，几乎每一个“十年”均有其明显的“年代”特征，而以“事件”为界标，则或于有意无意间漠视了对以“年代”为代表的历史连续动态过程的观察，或于历史的真相不无有心与无心的遮蔽与忽略，不利于我们对历史多重面相的认识。

有鉴于此，我们规划以民国历史之纵向发展为主轴，以年代为大致分期，召开有关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数次国际学术讨论会，邀集海内外历史研究者，就相关时段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教育、社会等问题，进行深入而富有新意的讨论，并于会将论文汇集成册，俾便反映讨论的成果，推动研究之进步。首次“1920 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 2004 年 7 月 25 日至 29 日在宁夏银川市联合主办。来自中国内地、香港、美国、韩国的近 60 名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并提交了 43 篇论文，内容涉及 1920 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社会等领域，展示了 20 世纪中国历史这一重要时段的方方面面。

1920 年代在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既是民国政治由北洋军阀掌控的北京政府转换到国民党掌控的南京政府的转折时期，又是国共两党由合作发起国民革命及北伐战争到最终关系破裂走向内战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经济有起有落、新文化运动继续发展、社会动荡转型的历史时期。近年来，随着大量历史档案资料的解密公布，海内外学术界对 1920 年代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了相当的进展，此次讨论会可谓对相关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对于引发学界就相关问题之思考，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总体而言，提交此次会议的论文大致有如下特点：其一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其二是注重对新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和地方资料的发掘和运用；其

三是研究视角更趋多元，研究方法更趋多样，对历史的客观再现和研究结论更接近于实际；其四是在关注历史“新”问题的同时，对“老”问题有新开拓。

此次会议的召开，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工程的经费支持。在筹备与召开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外事局和近代史研究所的领导、近代史研究所科研处、《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均予以大力支持，《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曾学白承担了主要的会务工作。与会学者致力学术，自由讨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使会议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会后又提交会议的论文做了认真修改。对上述所有为此次会议做出贡献的单位和学者，我们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有长远的历史渊源。1950年代以来，曾有多位原供职于近代史所的学者调动到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为两个单位的学术往来架起了沟通之桥。近年来，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建设，尤其是对民国专门史研究着力颇多，并与近代史所的诸位研究同仁有较多的学术往还。作为此次会议的共同发起者与主办单位之一，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领导和同仁，对会议的圆满召开及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在策划、选题、经费、会务等方面，出力甚多。我们在此对他们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次会议论文集的出版，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支持。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金以林副研究员承担了论文集的全部初期编辑、校对工作。对他们为本论文集出版所做的贡献，我们亦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次“19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的出版，是民国史研究室拟出版的系列专题研究论文集之开篇。我们将继续以“年代”为论域，邀集海内外学界同仁，讨论民国史的相关问题，并以学界精英之研究成果，出版民国历史专题研究之汇集，以此贡献于民国史研究学界，并期待学界同仁之批评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2005. 5. 18

CONTENTS

目 录

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政治

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

——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 金冲及(3)

“革命”与“反革命”：1920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

党际互动 王奇生(23)

苏俄、中共与国民党的“左右”分化 杨天宏(38)

国民党左派研究的两个问题 苏维初(56)

北伐初期广东地区的劳动运动与国民政府的

应对 [韩] 裴京汉(77)

吴佩孚与苏俄及北京知识界

——军阀生涯中的一段插曲 耿云志(89)

护法时期的李烈钧与唐继尧 徐辉琪(98)

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对直系斗争

——以汪精卫居中联络为中心的考察 刘贵福(117)

第一届国会的最后一幕

——1924年北京政变后的国会非常会议 李学智(129)

再论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发动 左双文(140)

1920 年代末至 1930 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

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其政策走向 曹成建(157)

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

——以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的考察 金以林(175)

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经济

上海钱业公会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的若干内债

——对已刊未刊档案史料的比照阅读 吴景平(195)

上海银行公会与 1920 年代的华商银行业务制度建设 张天政(216)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

——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 朱荫贵(234)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十年间中国手工业的转型 史建云(250)

1920 ~ 1940 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

——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 黄道炫(266)

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外交

外交、外债和派系

——从梁颜政争看 1920 年代初期北京政府的

外交运作 陈 雁(287)

蒋介石、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之交涉 杨奎松(304)

1920 年代国民党人的联德思想与实践 马振犊(327)

国民外交的一次尝试

——中国代表参与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一次会议之前后 张 静(341)

北伐时期列强对华政策研究评介 牛大勇 陈长伟(360)

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文化

- 1920 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 章 清(383)
- 泰戈尔访华与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论争 郑大华(403)
- 胡适 1926 年对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访问 罗志田(421)
- 章太炎 1920 年长沙之行考实 马 勇(436)
- 青年毛泽东与湖南自治运动初兴
——以 1920 年代前后毛的国际视界为中心的讨论 李玉刚(457)
- 东西方汉学的一对巨擘
——陈寅恪与伯希和学术交往述论 王 川(474)
- “军阀”治下之军阀“学理”研讨
——以北伐战争前夕一场政治与学术论战为中心 徐 勇(488)
- 清华政治学系的创办及其前后之史事 孙宏云(507)
- 胡汉民“三民主义立法原则”考 贺 渊(524)
- 检查、控制与导向
——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 汪朝光(540)

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社会

- 1920 年前后两次争国权运动的异样形态及形成原因 陈廷湘(559)
- 1920 年代广东的民间武器 邱 捷 何文平(577)
- 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
——1929 年中医存废之争评析 左玉河(595)
- 1920 年代在满韩人国籍问题的构成与解决的
探索 {韩} 孙承会(615)

农民协会和合作社：走向民粹主义 [韩] 柳鏞泰(628)

华洋义赈会的农村合作运动和中国现代农业金融的

困窘 [美] 陈意新(641)

华纳在华居留期间的政治学与美学 [美] 蒲乐安(658)

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政治



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

——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

中央文献研究室 金冲及

读大革命的历史，很容易注意到一个问题：北伐初期，湖南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得如火如荼，全省农民协会会员达到120万人^①，采取激烈的革命行动，在多数农村取得支配地位，对全国产生巨大影响；但在1927年5月的马日事变和7月的武汉分共后，却迅速低沉下去，农民协会几乎全部瓦解；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先后从湖南转移到井冈山后，把主要发展方向指向赣南、闽西，而不是重返湖南。前后之间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这是什么原因呢？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作一点探讨。

一 前 夜

事情要从比较远说起。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早期成员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其中师范生占有不小比重，如毛泽东、蔡和森、郭亮、夏曦、蒋先云、夏明翰、黄克诚、粟裕、萧克、张际春、张平化等。这是因为师范生一般家境比较贫寒而又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容易接受新思想。那时候，第一师范在长沙，第二师范在常德，第三师范在衡阳，这三个地方便成为中共党组织在湘中、湘西、湘南的活动中心。

湖南的党组织成立后，除发展党员、在各地建立支部外，最初的活动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一是从事工人运动。到1923年初，湖南已有工会20多个，并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有组织的工人达到四

^① 湖南农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宣传工作决议案》，1926年12月，中央档案馆、湖南档案馆编《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编者印行，1983，第191页。

五万人。但“湖南本在产业不发达之区。全省矿业，均多系土法开采；商办之工厂，几无一所”^①。工人大多是手工业工人和苦力，生活艰难而缺乏保障。倒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是当时中国较大的矿业，主要供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之用，因此修有铁路与粤汉铁路相接，政治、经济上同湖南的关系反比江西更为密切，在湖南工人运动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湖南是重要的农业省份，向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但在地主剥削下，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极为贫困。拿地租租额来说，长沙“最高十分之七，普通十分之五”；湘潭“佃农所得占收获十分之三，田主所得占十分之七”；湘乡的封建剥削更严重^②。由于农民一家一户生产的分散状况和传统的束缚，一般仍是忍气吞声，默默挣扎。

湖南党组织的注意力很长时间内集中在城市里，工人工作做得比较多，农村工作做得很少。直到北伐战争开始前一年，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区委的一个报告中谈到“农村工作问题”时仍写道：“此项没多讨论，因为农民运动太没有做，有些意见或议案，都不能实行，明白的说：无人去执行。”^③这虽是青年团的报告，但党组织在这方面的状况也大体上可想而知。

1923年8月，谭延闿奉孙中山之命，从广东举兵入湘讨伐湖南军阀赵恒惕。9月间，衡山农民乘谭赵作战之机，成立岳北农工会，推举中共党员刘东生、谢怀德为正副委员长。岳北农工会成立后，主张改良农民生活，“阻禁米谷出口以平谷价”^④。入会的有6000多家，但湖南的党团组织并没有对它实行有力的领导。衡山是赵恒惕的家乡。11月中旬，重新占领衡山的赵部派军队捣毁岳北农工会，枪杀农民4人，捕去70多人。“初起的农民，当然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于是农民的反抗运动又暂行停止”^⑤。这件事引起人们的注意。陈独秀在《向导》上写了一篇《广东农民与湖南农民》，从中得出结论说：“因此，我们应该彻底觉悟：一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都不能离开政治运动，因为政治上的自由是一切运动所

① 《团湖南区委关于湖南社会经济情况的报告》，1924年3月，《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47页。

② 湖南农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地租问题决议案》，1926年12月，《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54页。

③ 团湖南区委兼长沙地委对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1925年1月16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15页。

④ 独秀：《广东农民与湖南农民》，上海，《向导周报》第48期，1923年12月12日。

⑤ 《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第52页。

必需的。”^①但岳北农工会毕竟是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只存在两个月左右，实际活动并不多，同省内其他地区也没有多少联系。

随着大革命的发展和对国情认识的加深，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逐渐重视起来。1925年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湘潭韶山家乡，组织乡农民协会，“到10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②，开始作一些阻禁运粮外出、实行平粜，增加雇农工资、减租等斗争。但毛泽东不久便离开家乡，这些斗争没有持续发展下去。再看长沙：“农民运动，始于民国十四年，当时很秘密。十五年一月，有大贤、嵩山等六镇乡组织农协。去年三月成立长沙县农民协会，恰是唐军（唐生智部）退衡时，所以招牌只挂一天，便取消了。”^③中共湖南区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后，党在农村中的工作有了些加强。“据1926年4月统计，全省有农协组织的已达28个县”^④，这些农协组织大抵都处在秘密状态，没有开展很多活动。

这便是1926年7月北伐开始前湖南农民运动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农民运动中虽已做了一些工作，但时间毕竟不长，活动比较零碎，基础依然相当薄弱。

二 高 潮

湖南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是在北伐军大举进入湖南后。

北伐军前进时，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很多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国民党进步人士。国民党的湖南省党部和各县党部是在共产党湖南区委帮助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部长在这年年底都前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在他们积极推动下，特别是由于有了比较好的政治环境，农民协会取得公开活动的地位，各处农民踊跃奋起，投身支援北伐战争。湖南农民运动出现了一个以往从未有过的蓬蓬勃勃的新局面。

《向导》刊载的一篇长沙通信，把湖南农民这时支援北伐战争的活动，归纳为5个方面：①供给：北伐军所经地方，农民即均能供给饮料，或少

① 独秀：《广东农民与湖南农民》，《向导周报》第48期，1923年12月12日。

② 《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第172页。

③ 《县农协代表大会开幕盛况》，长沙，1927年4月2日《湖南民报》。

④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第69页。

数之食粮，代为煮饭等事；②向导、侦探：此种工作，沿萍株路、浏阳、平江、长沙、湘潭、宁乡、衡山、南县、华容等处都有；③运输：农民自动受军队雇请运输者之外，有组织的替军队运输之事亦有；④扰乱敌人后方：湘潭、平江、南县、浏阳、沿株萍一带等处皆有；⑤参加战斗。

为什么农民会如此踊跃地支持北伐战争？这篇通信分析了4个原因：“A、党人宣传的效果，农民都知道北伐军是拥护工农利益的，要援助北伐军胜利，农民然后才能得到利益。B、对北兵叶军（引者注：指赵恒惕旧部叶开鑫的军队）之仇视，两方军纪比较，使农民仇视更深。C、受农民协会的指挥（有最少数是自动的）。D、在九、十月中农民之愿意参加战争，则为欲得到枪支，因此时农民武装的要求已经起来了。”^①这4条原因分析得都是对的。还有一点似乎也应该提到：就是北伐军对军阀部队迅速地取得摧枯拉朽式的胜利，并对农民的活动采取热情鼓励和支持的态度，也为农民壮了胆，减除了许多顾虑。

这时，各县的农民协会得到比较快的发展，但在农村中还没有发生大的冲突。毛泽东在不久后的一篇通信中写道：“此时期农会会员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能直接指挥群众也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没有甚么争斗，因此各界对他也没有甚么批评。因农会会员能作向导作侦探作挑夫，军官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②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就说过：“我们这次革命的成功，完全是工农群众的力量，并不是兵士的力量。我们在北伐的时候，在衡阳，在醴陵，在粤汉路，都得着工农群众的帮助，才得很顺利的杀却敌人。”^③

农民协会纷纷成立，使原本十分分散的农民有了组织，从这年10月起，湖南农民运动便进入一个新阶段。

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向导》就已经开始注意到“现在农民的倾向”：“农民已觉得他们参战有功，需要报酬了，就是没有参战的各县，也觉得党人的宣传应该兑现了。”^④他们在经济上的要求主要是减租、减息，解决荒月食粮问题，减捐税，减押金及不得无故退佃等；在政治上的要求主要是改造团防局，希望有一个好的政府。这些要求还很低，有些地方只提出其中的一两种。但再过一个多月，毛泽东在1927

① 湘农：《湖南的农民》，《向导周报》第181期，1927年1月7日。

②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向导周报》第191期，1927年3月12日。

③ 《唐总指挥在长沙对农工之重要讲话》，汉口，1927年2月19日《民国日报》。

④ 湘农：《湖南的农民》，《向导周报》第181期，1927年1月7日。

年1月4日至2月5日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农民运动高涨的县去进行32天调查时，发现这些地区的形势已有了很大变化。

农民组织起来后，局势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毛泽东在当时对这种新局面作了有声有色的描述：“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指挥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上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有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他们主要攻击目标为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农村各种宗法思想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他们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绅士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①

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动。它大抵是农民争取自身权益时发生的，带有相当大的自发性，也出现一些过激行动。据李维汉回忆说：“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这些作法容易失去社会同情。”“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这些虽是运动的支流，但不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联合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敌人。”^②

为什么湖南农民运动会这样迅猛地发展起来，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人们又应该怎样看待它？这自然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决不是谁要它怎么样就能够成为怎么样的。

当时《湖南民报》有一篇论说，在叙述湖南农民运动发展的状况和原因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民已经取得自由，若要不发生纠纷，除非剥夺其自由，任他永远压在地狱。”“土豪劣绅屠杀农民，一次十至数百人，他们熟视无睹，一闻农民逮捕个把绅士，拿起短棍梭标游行，就伸着舌头，‘危险咧’。农民反抗事件与所受压迫事件，虽不过几分之几，而已震惊殊俗了。”^③

①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向导周报》第191期，1927年3月12日。

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97页。

③ 觉斋：《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1927年3月15日《湖南民报》。

我们可以再看一看，就是武汉政府一些国民党要人当时也有类似的说法。唐生智说：“目前的阶级争斗，与其说是劳资冲突，无宁说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冲突。几千年的历史，农民都伏在统治者之下，忍气吞声。现在革命的呼声，将他们唤起了。他们从被治的地位，渐渐要爬起来了。以历史上的因果及物理上的通性，冲突自然是有的。在这个情状之下，各界应该平心静气的承认封建的遗迹快要消灭了，民主制度的社会必须建立了。”^①孙科说得更激烈：“现在一般的民众，以至党内的同志，却都有不少是怀疑农民运动的人。他们掂拾一两件农民运动初期的病态的幼稚举动，便想（把）本党的农民运动根本抹煞。”“革命以（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任何个人的意思，乃是因为当时的民生实在受着重大的压迫。……爽快说句，中国的农民实在都有革命的要求，这是我们万万不能抹煞的事实。那末我们在今日唤起农民去参加革命，还有什么可疑惑之点呢？”^②

可以说，这场革命大风暴是湖南农民长期以来受尽地主豪绅欺凌压迫而无处诉说中郁积起来的全部仇恨和愤怒，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次大爆发，真是所谓“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③。如果没有农民长久蓄积的强烈仇恨和反抗要求，没有这种深层背景，任何人或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在农村中掀起一场革命大风暴来。运动中的某些偏差自然无需讳言，那是在这场革命风暴短时期内以席卷一切之势迅猛展开中出现的，而且相当程度上是农民处在极端兴奋状态下的自发行动。

在谈了这个根本方面以后，还要注意到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湖南农民遭受深重的封建压迫，是多少年来一直存在的事实，并不是在这一年内矛盾突然激化了。为什么他们在此时会于很短的时间内掀起如此规模的革命大风暴？这又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外在地条件，那就是当时国共合作下的北伐军迅速北上、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控制湖南全境这个大形势。前面所说“特定历史条件”，就是指这一点而言。

那时北伐军和湖南的国民党党部、省政府仍高举着国民革命的旗帜，公开表示支持农民运动。1926年8月，也就是北伐军占领长沙后一个多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根据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的精神，通告各县农运特

① 《湖南人民欢迎唐总指挥大会纪盛》，1927年2月11日《民国日报》。

② 孙科：《国民革命中之农民运动》（续），1927年3月15日《湖南民报》。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394页。